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GONGGONG ZHENGCE DE
ZHENGZHI JINGJIXUE

Gonggong Zhengce De Zhengzhi Jingjixue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黄新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GONGGONG ZHENGCE DE
ZHENGZHI JINGJIXUE

Gonggong Zhengce De Zhengzhi Jingjixue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黄新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黄新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161 - 0540 - 5

I. ①公… II. ①黄… III. ①政策科学 - 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1258 号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黄新华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8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领域，而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对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创新研究。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政府管理创新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依法行政的水平。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服务的创新研究，对于推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向前发展，增强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应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治理与政策创新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我校就设立了相关的系科，中间几经调整分合及停办。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作为国内首批恢复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我校复办政治系，不久更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系”，2003 年成立公共事务学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以及原来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始终把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作为学院的发展重心。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设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另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二级博士点），行政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政治学理论 3 个省级重点学科，福建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公共政策与政府创

新研究中心”，福建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福建省公共政策教学团队，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及“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厦门大学“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等。

我校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教学走在全国前列，已经形成一支以青年教师为主、专业结构比较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人才团队。其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及特等奖提名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省高校名师、福建省“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和“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等优秀人才；并形成了包括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分析、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服务及其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社会管理及社会保障、国家学说、新政治经济学、社会性别与公共事务等在内的多个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或方向。

作为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及“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研究成果，“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围绕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这一核心，遴选我院教师“211工程”及“985工程”课题研究成果以及优秀博士论文汇集出版，旨在显示近年来我院公共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加强与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应用。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陈振明

2011年4月6日

（厦门大学90华诞纪念日）

目 录

总序	(1)
第一章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1)
一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2)
二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8)
三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深化	(13)
第二章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19)
一 理性选择分析	(19)
二 交易成本分析	(29)
三 比较制度分析	(42)
第三章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49)
一 公共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特点	(49)
二 公共政策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	(52)
三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评析	(81)
第四章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87)
一 政治决策机制理论	(87)
二 决策者内生和外生变化理论	(91)
三 政策可信性理论	(95)
四 政策变革理论	(98)

2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五 政策选择理论	(101)
第五章 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110)
一 财政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知识背景	(110)
二 财政政策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113)
三 财政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122)
四 财政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简评	(133)
第六章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136)
一 贸易政策理论研究视角的变迁	(136)
二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141)
三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149)
四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局限	(157)
第七章 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160)
一 经济学分析中的汇率政策	(160)
二 汇率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	(166)
三 汇率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177)
第八章 再分配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184)
一 再分配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184)
二 再分配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192)
三 再分配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213)
第九章 环境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216)
一 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环境政策研究的转型	(216)
二 环境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221)
三 环境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	(225)
四 环境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	(234)

第十章 规制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238)
一 规制政策的传统理论解释及其局限性	(238)
二 政治交易成本与规制政策制定	(243)
三 有限理性与规制政策的委托代理	(247)
四 可信承诺与规制政策的信誉	(251)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71)

第一章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导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衰落。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促使政治经济学复兴,出现了政治学与经济学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①新政治经济学反对把政治学与经济学隔绝,强调政治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行为。认为个人在政治领域和经济过程中均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政治的机制和市场所带来的机会和附带的约束的不同,“正是在适用同一种行为原则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具有因果联系上,政治学与经济学统一了”。^②但是,这时候的政治经济学“几乎摆脱了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③政治经济学“指的是一种试图同时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的研究:制度怎样根据个人的动机、策略和选择而演化,以及制度怎样影响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表现?它使用经济学的方法——自利的个体在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策略行为——来解释政治过程的起源与维持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④通过关注政治过程如何制约、引导和反映个体的行为,分析市场现

① 黄新华:《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② J. A. Caporaso & D. P. Levine.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1.

③ 《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0 页。

④ 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921 页。

象作用于其中的政治情境,在最近30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制度的行为理论,二是对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在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制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一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兴起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公共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蓬勃兴起,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

1. 政治经济周期与公共政策

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简称PBC)指的是政治因素或者政治过程引发的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伴随着政治经济周期的更替,政府制定不同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发展随着周期性的政策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周期。政治经济周期关注的是政策周期性波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经济波动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指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之间出现明显差异,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或负增长)交替出现,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轮流发生。^①面对波动,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乃至熨平波动,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周期中,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影响。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理论有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和党派信徒政治经济周期模型。

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克雷默(Rosanne M. Kramer)、塔夫特(Edward Tufte)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等。20

^① 厉以宁:《市场经济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世纪 70 年代初期到中期,克雷默研究了经济因素对美国国会选举的决定作用。塔夫特在《经济中的政治控制》中指出,选举前的经济状况会明显影响选民的选择,政治家由于充分了解上述事实而试图加以利用。无论是政治工具本身,还是与政治周期相关的经济活动,以及选举左右一段时期的经济波峰的度量指标,它们的周期性波动都证明了后一个前提条件的存在。^①换言之,政治家可以利用对选民的了解制定公共政策使自己赢得选举。

诺德豪斯进一步扩展了克雷默和塔夫特的观点。在选举之前,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获得较高的非预期货币增长,降低失业率,虽然这项政策的实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会在选举结束之后出现,但是就单独的一个选举周期而言,货币扩张水平和失业率降低水平会使选民的满意程度达到最大。选举结束之后,政府为应对选举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高通货膨胀率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经济将会进入“衰退”期。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同样的行为会重复发生。因为短视的选民在整个政治经济周期中关心的是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并不考虑在位者早期的宏观经济实绩,也不考虑明年经济可能的表现,也就是说,选民的偏好是既定的,政府实施的就是保证其能够再次当选的政策。

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关于选举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遭到后来研究者不同程度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假定竞选连任的任职者能够控制货币政策的选择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不一致的,赢得选举的条件依靠选民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合理的,忽略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也是有缺陷的。虽然早在 1975 年唐斯(Anthony Downs)就提出了两党制中政党总是有意改变其政治纲领,以便使其与另一个政党的纲领彼此相似,但是现实世界的政策趋同并没有达到唐斯所预言的程度,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导致了不同的经济政策选择。因此,不同于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学者们提出了党派信徒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用以揭示政治经济周期对经济政策制定和选择的影响。

党派信徒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的代表人物有弗雷·施奈德(Frey Schneider)、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A. Hibbs)等。他们认为政党所偏爱的政策不同是形成政治经济周期主要甚至唯一的驱动力。希布斯指出,在美国,民主党和共

^① 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7 页。

和党所偏爱的政策不同是因为代表的选民不同，民主党的核心选民是劳动阶层，他们持有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当存在额外失业时，他们承受的损失与所占的经济份额就不会成比例，而且要付出更广泛的社会成本。共和党的核心选民是富裕阶层，他们持有金融资本，因而承受着额外通货膨胀损失中最大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与共和党的选民相比，拥护民主党的选民一般对失业表现出更大的厌恶，但对通货膨胀却不那么反感。^① 选民利益的差别就会导致政党偏爱的公共政策不同。

希布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12 个西欧国家和美国的经济政策预期结果的模型进行了检验，他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数据说明，左翼政党执政时，出现低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在中右翼政党执政时，会出现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希布斯用战后英美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认为失业率在民主党和工党执政时会下降，在共和党和保守党执政时会上升。希布斯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政府追求与其经济利益和不同阶层核心政治选民的主观偏好相符合的宏观经济政策”。^② 当政党进行轮换时，造成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政党之间的偏好差距很大时，造成的经济波动也会很大。

2. 理性预期与公共政策

虽然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表明选举导致的政党更替会带来经济政策变化，但是选民具有理性预期，经常变动的政策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执政者的最优选择是坚持不变的经济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探讨了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的相关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称理性预期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卢卡斯（Robert Lucas）、华莱士（Neil Wallace）和萨金特（Thomas Sargent）等。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会根据过去价格变化的资料，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作出预期，这样，他们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成为干扰因素，但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选出最小风险

① 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6 页。

② Douglas A. Hibbs.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s, Vol. 71, No. 4. 1977: 1467 - 1487.

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由于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灵敏及时,政府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在个人的理性预期下,政府任何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任何政策都是无效的。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因为政府干预使人们学会了理性预期,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人人预防、人人自保”的局面。因此,政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公开自己的政策,并且宣布长期不变,这样公众就不再去预测政府对于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将发生何种变化,不再采取预防性措施了,那么,经济运行也就走入了正常轨道。^①

基于上述观点,理性预期学派论述了理性预期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指出,政府最好的货币政策是不变的政策,因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货币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的。因为在理性预期下,人们对经济形势进行预期的时候会尽最大努力去获得最完全的信息,在有效地掌握和利用一切有关信息的前提下作出明智的决策,政府任何“愚弄”人们的货币政策都将失效。例如,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时,人们因为早已掌握这个信息,就会预见到物价将会普遍上涨。为了避免物价上涨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如果是借贷资本家就会预先提高放贷利息;如果是工人就会预先要求增加工资;如果是企业家就会预先提高产品价格。这样,当社会总需求曲线因货币供给量增加而上移时,结果是总供给、总需求的均衡点沿着一条既定的新古典总供给垂直线上移。于是物价普遍上涨,而产量、就业量却维持原有的水平不变。^②当中央银行出乎公众意料地增加货币供给时,由于公众对此没有察觉,所以厂商和工人很有可能认为这种价格变化是个别市场的需求提高引起的。于是,厂商会提高产量,工人有可能提高工作量。相反的,如果货币供给减少使得价格下降时,厂商会误以

① 杨翠兰、张明映:《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评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② 丁冰:《试析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学派》,《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9期。

为对他们的产品需求下降,因而减产,工人们也会自愿地减少劳动供给。这意味着萧条时期的失业是人们权衡得失后的选择,是自愿的。当所有市场的厂商和工人都这样行动时,实际产量就会偏出正常水平,在短期内引起经济波动。^①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人们具有理性预期,所以会很快地调整错误,这样产量又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也就是自然率水平。

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政府不仅应当维持不变的货币政策,而且也需要贯彻不变的财政政策。当第一次减税时,人们可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但当再次减税时,人们就会预期政府将更多地举债,将更多地支付利息,这样,将来的赋税肯定会加重,因而人们就不会像第一次减税时具有那样高的增加消费和投资的热情了。但是,如果政府实施一种使财政预算平衡的税率,会有助于经济的稳定。这是因为通过减税来刺激人们去增加投资和消费是不可能的,人们的理性预期会使人们增加投资和消费的热情逐渐被抵消掉。所以,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所能做的最好努力,还是制定使预算平衡的税率。只有这样,公众才不会由于理性预期而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政府也才能取信于民,使经济趋于稳定。

3. 时间一致性与公共政策

1977年,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规则优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时间不一致性》,摒弃了建立在最优控制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政策设计思路,把博弈论引入经济政策的研究之中,在宏观经济政策设计上,提出了时间一致性概念,说明信誉在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上的重要作用,为坚持规则和相机抉择的取舍提供了分析方法。所谓时间一致或不一致是指,政府宣布当期的经济政策和下期的经济政策,民众根据这些经济政策作自己的决策,在经济当事人实施了经济决策后,如果政府没有动机改变下期的经济政策,就是时间一致,否则就是时间不一致(或称动态不一致)。由于时间不一致,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原先设定的最优政策被调整后,人们不再相信政府,政府的政策不再得到民众的配合。

导致时间不一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参与人的偏好随时间变化而变

^① 蒋永穆、安雅娜:《从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化,如果人们的偏好是时间的不规则函数,人们在某一时点上作出的最优决策往往是时间不一致的。第二,社会和私人个体的偏好不一致。政府官员个人的理性主义不能充分代表政府,政府偏好并不总是与社会偏好一致,作为一个集团,政府也有利己性。这种政府官员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利益冲突导致了时间不一致性。第三,经济个体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即使政府是仁慈的,但是由于个体之间偏好的冲突,也会产生政策时间不一致。因为每个个体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个体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行为,也受到其他自利的个体决策的影响,从而经济中出现外部性,仁慈的政府不能代表具有效用相互依存性的全部私人个体实现福利最大化,有承诺和没有承诺的均衡条件是不同的,时间不一致性就产生了。

解决时间不一致性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令人相信的事前承诺,使经济个体相信在给定经济个体的最优行动之后,政府的承诺性政策仍然是最优选择。第一,签订最优契约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经济政策产生时间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定者总是有激励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的办法,通过“愚弄”经济个体以谋取短期利益。解决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问题就是要使政策制定者无法或者没有激励去制定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来加大政策制定者的“食言”成本。这可以采取立法或者同政府预算相联系的办法,来规定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第二,增强政策制定者的独立性。通过立法或其他的形式规定政策制定者的行动规则,使政策制定者遵守约束的规则,例如,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有效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第三,建立信誉机制。尽管通过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和增强政策制定者的独立性,可以从理论上避免时间一致性问题的出现,但是如果有信誉机制,政府并不一定有完全的激励机制去按制度的约束行事,因此,信誉在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时具有重要作用。^①但是,政策制定者信誉的形成、维持和消亡取决于重复博弈、不完全信息等,也取决于特定社会的文化道德观念和歷史传统。

^① 康锋莉:《规则与灵活性选择下的财政政策——关于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文献综述》,《税务与经济》2009年第2期。

二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通过引入了政党竞争、投票活动以及派系活动等政治变量,^① 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 理性选民与公共政策

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政治家可以控制货币政策,这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相悖;二是选举的成功取决于部分选民的非理性行为。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赛博特(Anne Sibert)在诺德豪斯的基础上修正了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阐明了在选民理性以及前瞻性的情况下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周期的关系。政治家为了使再次当选的概率最大化,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制定公共政策产生暂时繁荣的幻觉,一般会通过政府支出、税收和货币发放等形式。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时滞,选民无法直接观察政治家的能力,因此用来判断社会福利是否最大化就取决于人头税和铸币税,那么,在选举之前,执政者就会利用公共政策操纵“信号传递过程”使得选民认为自己具有能力。例如,执政者在选举之前制定了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从而得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由于预算过程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选民意识不到减税和政府开支增加的公共政策会导致选举之后的税负增加,于是便导致了经济的波动。^② 因此,与单纯的机会主义模型不同,理性机会主义侧重的是选举前后对各种政策工具的操纵。在理性机会主义中,由于投票人是理性的,操纵财政货币政策产生的周期将会

① 王春萍:《实证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政治因素对宏观经济影响分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② Kenneth Rogoff and Anne Sibert. Ele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5, No. 1. 1988: 1 - 16.

更不规则,持续的时间将会更短。^①

2. 理性党派与公共政策

阿莱西那(Alberto Alesina)在党派信徒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形成因素,提出了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波动的驱动力并不是党派差异本身,而是这些差异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了一起。根据执政者的任期的两段不同经济效应将一个完整的任期划分为两个区间,假定政党仅仅关注于自己所在的任期,左、右翼政党关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失业率偏差至少有一个成立,用理性预期假设代替了适应性预期假设,通货膨胀预期在选举之前就形成了。在一个完整的任期之内,决定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演变的关键是每一个区间中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这样执政党就会根据每一个任期的通货膨胀率选择最优政策。当政府可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时,可以计算出最优政策。反过来,通货膨胀预期也取决于对谁将在下一届选举中获胜的预期。如果选举结果完全是已知的,就不会产生任何周期行为,在整个任期之中,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

但是,当党派选举结果不确定的时候,阿莱西那证明了选举前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小于左翼政党执政的通货膨胀率而大于右翼政党执政的通货膨胀率。所以如果是左翼政党赢得选举便会制定导致经济“繁荣”的公共政策,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相反右翼政党赢得选举,由于其不偏好于扩张性政策会在任期之初制定“衰退”的公共政策,表现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高于自然失业率的失业率。此外,在大选前夕是不会有Any效应的,因为选举的执政党不会急剧地推动经济变革,赢得选举的概率与任职者的政策是不相关的,政党是彻底的党派信徒,它丝毫不具有任何机会主义的特征。

3. 财政幻觉与公共政策

财政幻觉是指个人在作出财政选择时必定介入的制度会发生引起幻觉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足以改变个人的行为。丹尼斯·缪勒(Dennis C. Mueller)指出,以下几种情况的存在会产生政府增加收入,扩大支出的财政幻觉:(1)隐瞒公共支出中个人机会成本的份额;(2)在纳税人认为可能有利的时期或活动

^① 杜两省、刘勇、王悦:《西方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发展》,《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